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之路：“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根脉、思想契合与时代价值

唐兆麒 陈林华

武警警官学院，四川成都，610213；

摘要：“两个结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代发展的深刻把握，其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更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结合”视野，意蕴深远。本文通过解构“原理”与“文化”的契合关系，阐明二者在价值追求、实践导向与哲学思维等维度的契合性，论证了“结合”的基础，揭示了“结合”并非简单拼接而是创造性转化的有机融合。“第二个结合”不仅为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还为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世界无产阶级斗争提供了新的范式，展现出其强大的理论张力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个结合”；思想契合；时代价值

DOI：10.69979/3029-2700.25.12.046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曾经创造出辉煌的文明成就。而1840年之后，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逐渐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这个以农为本的古老国度被强行接入到世界历史当中，走上了一条“现代化”道路。

由于极度缺乏进入现代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被迫的、外源性的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改造的过程，是一种裹挟着西方市场经济野蛮摧毁中国原生自然经济的过程。这一历史性转折，促使中国精英分子重新审视传统制度和文化。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百年来的各种自强运动皆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内核，至于中华传统之文化常以配角身份出场。

随着物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属于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思想”开始共生并存，并行不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之一。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把视野放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形成了“第二个结合”。我们认为，“新的结合”绝不是语词上的简单铺陈，而是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洞察，同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必然。

1 历史根脉：“第二个结合”是对“第一个结合”的继承发展

中国共产党以“第一个结合”为理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对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革命。而今天的“第二个结合”也不是无根之木，它实质上是对“第一个结合”的继承发展，既继承了“第一个结合”注重实践品格的理论特质，又突破了原有结合范畴的局限。

1.1 “第一个结合”的历史背景与核心要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第一个结合”理论，植根于中国共产党人突破教条主义束缚的集体觉醒。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党内有所谓的“城市中心论”和“武装暴动万能”思想，这和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让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里批判了这些思想，他反对那些把共产国际指示当教条来机械执行的做法，还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论断。“第一个结合”的核心思想在方法论上完成了两个突破：在认识方面，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矛盾分析法抓住了中国社会的特别之处，正确把握了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的基本国情；在实践方面，它重点强调依靠调查来理论创造，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具化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理论。这种“结合”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思路，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延展至传统农业文明所产生的革命群众——农民，最终创造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

1.2 “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的血脉联系

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

思主义必须“民族化”，“第二个结合”已蕴含其中，但并未被详细展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已初步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探索。“第一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性成果，奠定了在农业国家搞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由此，孕育了毛泽东思想，并确立了“从实践来再到实践去”的工作方法，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当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路径的经历之必然性，“第二个结合”应运而生。

1.3 “第二个结合”的范式突破与理论创造

中国深受儒家学说影响，在治国理政的智慧上也应在儒家学说中挖掘优秀的思路。在和平年代，体现为“研究如何立德兴国、教民化民”，形成有凝聚力的文化集体。当代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价值认同却有所缺欠，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尤为重要。“第二个结合”对“第一个结合”的继承发展在于：不仅立足中国人民的物质实际，还要注重中国人民的精神实际。

随着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人民群众开始追求精神财富的增长与价值认同的统一，此时，“第一个结合”已无法满足文明形态建构需求。“第二个结合”继承了“第一个结合”对“实际”的关注，还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明层次将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西方，若要指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须充分考虑国家的特殊性，不仅实现改造世界层面的“第一个结合”，还要不断与这个国家的本土文化不断对话、交流、融会贯通，在文明层面实现“第二个结合”。

2 思想契合：“天下为公”与共产主义信仰的思想共振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思想史与文明史上两种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体系。前者产生于近代欧洲思想传统；后者根植于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的历史土壤。两个隶属于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产生的地理条件、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脉都完全不同，使得“第二个结合”面临深刻的学理挑战。但是，二者在价值理性层面相契合，为文明对话提供了本体论依据，使得“第二个结合”具备理论基础。

2.1 价值追求的跨时空共鸣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戴圣在编撰《礼记·礼运》中就写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

即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或真理。《礼记·礼运》将“天下为公”进一步细化，基于对“道德伦理”的不断纯化，假设性地提出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社会形态，却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社会根植于私有制，强调“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用上层建筑反复加固。在《宣言》中，马克思却创造性地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世界。“两个公有制”交相呼应，尽管他们的经济、地理、历史、文化条件不同，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上，“天下为公”思想与共产主义信仰同频共振。

除此之外，以“天下为公”与共产主义信仰的思想共振为主线，“克己复礼”与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天人合一”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经世致用”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等都具备价值导向上的一致性，“第二个结合”在其思想根脉上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2.2 实践本质的超文化契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上的契合，并非现象级的巧合，而是在内在逻辑上具备深刻的一致性——两者都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是农业文明基础生发的实用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二者在实践维度不谋而合。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及理论体系基石。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架构中，世界通过实践——即人类物质生产活动这一中介——被主体所认识和把握。换言之，马克思的认识论即实践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本质也是实践的，人类历史上一切思想上的、宗教上的问题的根源，不是感性的直观，而是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稳定、最长久的经济形态。得益于此种稳定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农业和手工业基础的、经验性技术知识得以产生。例如，中国古代《孙子算经》中的“鸡兔同笼”涉及现代“二元一次方程”，虽未提出“元”和“次”，但同样以“鸡兔同笼”的实践方法解决了二元一次方程。此外，中国传统思想常常以道德实践为根基，始终聚焦现实人生关怀。中国哲学传统中不存在独立于现实的实体世界，亦无“此岸”与“彼岸”的二元对立。即便强调“波罗蜜多”（paramita）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演变为“佛性就在现前，当下即是道”的此岸文化。融合了儒、释、道思想的古典新儒学——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其中，

“行而不知，非真行”暗含马克思主义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虽然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显著不同，但是在“改变世界”上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克服与批判资本主义和形而上学，可以通过结合同样包含拒斥形而上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实现。

3 时代价值：为中国、为世界、为无产阶级

“第二个结合”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第二个结合”赢得了人民群众，作为中国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一股物质力量。同时，破除了“西方模式”，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与帮助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新范式。

3.1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结合”的具体产物。它既吸收了现代化这一源于西方历史语境的概念，又立足于中国独特的国情与文化传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体现了对中国客观实际的尊重和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融入，使中国发展进程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第二个结合”本质上是文化上的结合，但同时也需要、也正在赢得人民，将之转化为一种物质力量。中国的革命、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从未脱离马克思理论。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民族智慧中传承。文化将转化为社会建设的物质力量，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直接通过自身理论的先进性来赢得人民的，而是移默化的、深远持久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语言、劳动、习俗当中。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可以以潜移默化的、深远持久的方式吸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以此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创造性。

3.2 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二个结合”通过其理论的真理性为全球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启示。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与时代性挑战，中国人民通过“第二个结合”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可概括为“和”与“合”的理念。

“和”就是和平，首先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稳定不要动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的主基调，也同样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向往。在和平基础上应当“求同存异”，做到包容别人的不同，不干涉别人的发展。在“和”和

“异”的基础上，最终要达到“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和”“合”发展的基础上包容交流，融合发展，走出一条属于人类的道路。

当前国际形式波谲云诡，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永远是和平。中国人民倡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倡导建立和谐世界，主张“和为贵”，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些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思想，现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向世界讲清中国的道理，道明中国的底线。

3.3 为世界无产阶级斗争提供了新的范式

“第二个结合”理论与实践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可供观察与借鉴的中国治理经验。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后，并不能机械和盲目地发展生产力，而是要立足本国实际。发展道路是有历史延续性的，这正是我们当今不断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特色”，就是因为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蕴含着中华民族从历史中走来的点点滴滴。“第二个结合”直接指出了这种联系性，深度发展了这种联系性。这种文化融合创新的发展范式，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实践范例和理论启示。

“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于文化中，这样的模式在理论维度开创了具有革新意义的认识论突破，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新的发展范式，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处理好“古今中外”问题，将本国传统资源转化为无产阶级领导国家现代化发展力量提供了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王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逻辑理路[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07).
- [2] 陶德麟.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J]. 红旗文稿, 2010(02).
- [3] 刘建军.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J]. 新华文摘, 2022(7).
- [4] 陈先达.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J]. 精神文明导刊, 2016(7).
- [5] 吴晓明. 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J]. 学术月刊, 2006(02).

作者简介：唐兆麒（2003—），男，汉族，湖北武汉人。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陈林华（1976—），男，汉族，湖南资兴人。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